

近二十五年国内明代西北研究综述

程利英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提 要】对明代西北的研究,近 25 年(1978~2003)来国内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涌现出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涉猎的内容极为广泛。

【关键词】明代;政治;经济;文化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5)02-0126-04

一、政治

甘肃镇是明朝特殊的边境保障地区,明政府在该地实施的政策和军事措施、制度等也具有独特性。

政策:秦川《明政府开发西北决策的若干启示》(《兰州学刊》1991年,第1期)和《试论明朝在西北的退缩战略与开发西北的决策》(《社科纵横》1992年,第4期)分别概述了明政府在抵御蒙古势力、巩固西北边防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制定的开发西北决策及启示和明朝在西北采取退缩战略的原因、结果。关于明政府对西北民族地区的决策,杨秀清《试论明朝对西北民族问题的决策》(《民族研究》1994年,第6期)和董倩《明朝对西北民族地区的经营析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看法一致,认为是放弃西域,重点经营甘青藏区,且后者获得了成功。苏发祥的《简论明朝对甘青藏族地区的治理》(《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系统研究了明朝对甘青藏区政治、经济、宗教上实行的基本政策及其意义。陈庆英也认为明代对甘青藏区的政策是依靠对藏族僧俗首领封授官职,通过他们管理地方政教事务,同时通过和藏族僧俗首领之间的贡赐关系及控制茶马贸易等政治经济利益来使藏族首领对明归附(《明代甘青川藏族地区的政治述略》,《西藏研究》1999年,第2期)。洪海涛《明王朝前期统治洮州各民族措施概述》(《甘肃民族研究》1998年,第4期)概述了明朝前期统治洮州各民族的8条措施,指出通过其实施,明王朝加强了对洮州各族的统治,使此地明朝前期政局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经济不断发展。杜常顺《从西番诸卫看明朝对甘青藏区的统治措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秦川《明朝对甘青藏族地区的政策》(《社会科学》(甘肃)1991年,第6期)、尹伟先《试论明朝对甘青藏族地区的管理政策》(《西北史地》,1992年,第4期)、桑杰《简述明朝对岷州藏区的治理》(《甘肃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丁汝俊《论明代对西北边陲重镇洮州卫的经营》(《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等也对这一课题进行了研究。

军事:余同元《明代九边述论》(《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论述了九边的概念、形成、影响。肖立军《明嘉靖九边营兵制考略》(《南开学报》1994年,第2期),重点考察了九边营兵的大致编制和将领设置等,分析了九边营制对以后镇戍兵制的重要影响。梁森泰《明代九边的军数》

(《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和《明代九边的募兵》(《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分别探讨了九边的军数及明代九边军数与有明一代政制、军制、边防、社会经济的密切关系和明代九边募兵的来源、特点。刘仲华《明代嘉隆两朝九边消极的防守策略》(《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全面分析了明代嘉隆两朝采取消极防御战略的原因及其造成的明军战斗力低下和朝廷防而不和的民族狭隘思想等恶果。他又提出:分析制衡和以文制武是明代九边防务体制的指导思想。但是,在皇权高度集中的背景下,这一指导思想在事权、督饷、用人等方面的运用扭曲了它原来应有的作用(《试析分权制衡和以文制武思想对明代九边防务体制的影响》,《宁夏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韦占彬对九边设置的时间进行了辨析,确定九边初设于明成祖时期,明孝宗弘治年间设置完成。其中宁夏镇、甘肃镇属于初设边镇,设置时间为建文四年(1402年)和永乐元年(1403年)(《明代九边设置时间辨析》,《石家庄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关于九边的研究还有邓沛《明代九边述要》(《中国方域》1997年,第6期)和《明代九边考述》(《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4期)等。罗斌《元明清三朝在河州的地方组织》(《档案》1986年,第6期)对元明清时期河州的地方组织问题有所论述。张志纯、陈全仁《明清时期甘州丝绸古道上的驿递塘铺和防御设施》(《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对明清时期甘州丝绸古道上的驿道、塘铺及防御设施状况作了探讨。田澍《明代甘肃镇边境保障体系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3期)通过考述甘肃镇的独特地位等,揭示了该镇在明王朝的国防体系和对外贸易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和功能。

制度:高士荣《明代西北推行土司制度原因刍议》(《西北史地》1996,第3期)分析了明代西北推行土司制度的五个原因。王继光《甘青土司制溯源》(《西北民族文丛》1983年,第3辑)对甘青土司制的形成作了初步考察,指出元明之交是甘青土司形成的关键,文章重点研究了明代的土司制度。其《试论甘青土司的形成及其历史背景》(《社会科学》(甘肃)1985年,第4期)则论述了甘青土司的形成及形成的历史背景。其他论文还有张卫红《甘肃青海土司制》(《甘肃民族研究》1983年,第6期)、张维鸿遗稿,张令璋辑订的《甘肃、青海土司志》(《甘肃民族研究》1983年,第12期)、王树民《明

代以来甘肃青海间的土司和僧纲及其与古史研究》(《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等。

其他:杜常顺《史籍所见明清时期西北地区的土人与土达》(《青海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考证了明清时期西北地区的土人包括含土族在内的其他民族共同体和人们。提出,明代西北的土人普遍被称为土达,而达在明代通指蒙古,说明土人与蒙古族之间有着密切关系。樊保良《略述瓦剌与明朝在西北的关系》(《兰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认为15世纪初瓦剌与明朝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发生的重要关系,构成了西北民族关系既紧张又联系局面。姚继荣《甘青境内的大通与明代大通苑》(《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则提出明大通苑即设置于今互助县双树乡大通苑村,从永乐四年初设到正统二年裁撤,前后存在不过32年。梁新民《元代永昌路与明代永昌卫、清代永昌县的关系问题》(《西北史地》1985年,第1期)推测明代的永昌卫很可能就是在元永昌宣慰司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清在明永昌卫治所置永昌县。陈世明《明代甘肃境内二十四关考略》(《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系统介绍了明代甘肃南部崇山峻岭中积石关等二十四关及所处地理位置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对明代兰州的研究,赵一匡《明清时期的兰州府》(一)(《兰州学刊》1984年,第1期)、(二)(《兰州学刊》1984年,第2期)指出明朝时鞑靼是兰州的主要威胁,肃王移驻兰州后,兰州在西北的政治、经济地位都比过去重要起来。他的《明代兰州二三事》(《兰州师专1982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也对兰州府进行了研究。

对人物的研究,吴均《论明代河洮岷的地位及其三杰》(《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明晰考察了河洮岷重要的枢纽地位,明在该地的经营及当地三杰班丹嘉措、班丹扎喜、释迦巴藏卜在明朝与藏族的关系上做出的贡献。邵如林《甘肃明肃王初探》(《西北史地》1992年,第4期)对明肃王作了初步探讨。宋法仁《明肃王对兰州的贡献》(《甘肃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结合明肃王家族在兰生活繁衍了240多年,几乎与有明一代相始终一事,分析了他们对兰州的贡献。

二、经济

经济的发展是保持甘肃镇国防要地和民族贸易场所的基础,研究文章较多。张海英对明代南北经济状况进行了对比,作者在《明代江南与西北地区的经济交流——兼论官方市场对江南经济的影响》(《经济科学》2000年,第3期)中说:“明代江南与西北地区的经济交流中,官方贸易如政府控制的边境贸易对江南丝棉织品的需求等官方市场是一重要内容,它带来了江南市镇的繁荣、西北地区商品流通的繁荣及西北商人的活跃。”杜常顺《明清时期黄河上游地区少数民族经济浅论》(《青海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论述了明清时期黄河上游地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情况。田培栋《明清时期陕北的社会经济》(《理论研究》1981年,第7期)对明清时期陕北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了探讨。雍际春《论明清时期陇中地区的经济开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4辑)

则对明清时期陇中地区的经济开发进行了探讨。

有关屯田的研究:左书谔撰文四篇进行探讨,《明代西北屯田始于何时》(《社会科学》(甘肃)1986年,第5期)考证了明代西北屯田的起始时间。《明代西北屯田与西北开发》(《开发研究》1986年,第6期)则分析了屯田与开发西北之间的密切联系。《明代西北屯田破坏原因试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认为战争的影响、官豪侵占屯田和水利等是屯田被破坏的主要原因。《明代甘肃屯田述略》(《西北史地》1987年,第2期)对明代甘肃屯田状况进行了概述。梁四宝《明代九边屯田引起的水土流失问题》(《山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对九边屯田引起的水土流失问题作了论述。宁恢《资治篇:明代甘肃屯田何以成功》(《发展》1997年,第2期)指出明代甘肃屯田的成功,与明统治者所制定的和屯田相配套的较完善制度有密切关系。陈建平《明代安宁的屯田与民族融合》(《民族》1995年,第7期)也对此有所研究。

有关官牧的研究:魏丽英《明清西北官苑屯牧考略》(《甘肃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指出:明代官苑屯牧是当时西北畜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其盛衰、消长对西北地区的政局及后来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影响颇大。姚继荣《明代西北官牧制度中的马价问题》(《西北史地》1996年,第4期)概述了明代西北官牧制度中的马价问题。其《明代西北官苑官牧制度及其演变》(《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介绍了明代西北官苑官牧的牧马草场、牧马军人、马价、营卫放牧、官苑孳牧、印烙、比较、买补和禁约等制度及其演变,认为它反映了西北马政始盛终衰的发展过程。

关于水利问题的研究:王致中《明代西北水利试探》(《甘肃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探讨了水利在当时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支柱作用。并指出:明代西北水利主要集中在哈密至陇山之间的河西、三陇及河套诸地。吕卓民《明代西北黄土高原地区的水利建设》(《中国农史》1998年,第2期)对明代西北黄土高原地区的水利建设进行了全面探讨。其《明代河西、河湟屯垦区的水利建设》(《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3期)认为明代该区域水利建设取得了元代以前根本无法比拟的成就。唐景绅《明清时期河西的水利》(《敦煌学辑刊》1983年,第3期)研究了武威、张掖、酒泉地区的水利灌溉情况和河西各地的水利使用管理制度,指出,明清时期河西地区水利建设成就是极其显著的。江河《明清时期的兰州水利》(《兰州学刊》1987年,第3期)将明清两代兰州水利发展作为一个统一的历史阶段来考察,指出探讨其水利发展概况对于认识这个城市在明清两代的发展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该方面的研究还有王培华《元明清时期的西北水利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王迎喜等《明清时期河西走廊水利开发概况及其效果》(《开发研究》1988年,第5期)等。

有关马政马市的研究:姚继荣《杨一清与西北马政》(《西北史地》1988年,第4期)论述了明中期重臣杨一清多年为官西北,对巩固明朝西北边防的马政的策划整饬。他的《明代西北马市述略》(《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

《明代西北马政中的中盐马制度》(《宁夏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则分别阐述了明代西北马市对西北地区蒙汉民族经济的重要性和主要推行于以宁夏盐池为中心的陕甘宁毗邻地区的中盐马制度及该制度确立的重要意义。他发表的《明代西北马政机构置废考》(《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试说明代西北马政的衰败原因》(《青海社会科学》1994年,第31期)、《明代西北马政述》(《青海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也对马政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石莹《明代西北马政考略》(《兰州学刊》1986年,第5期)对明代西北马政的互市、官牧进行了研究,并分析了明代西北马政衰败的根本原因。这方面的论文还有张明富《杨一清与明代西北马政》(《三峡学刊》1995年,第2期)、杨秀清《明代西北马政得失谈》(《开发研究》1995年,第5期)等。

关于茶马贸易:白坚《明代西北茶禁与茶商的活动》(《青海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介绍了明代西北茶叶贸易从官营垄断、官商争利、官商分利,最后不得不听任商得其利的过程,指出这一贸易主动权的移转深刻地显示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商业贸易运行机制中的规律。石莹《明代西北的茶禁与茶商的活动》(《西北史地》1992年,第1期)也论述了该问题。他的《明初甘肃地区汉藏茶马互市初探》(《社会科学》(甘肃)1984年,第3期)就当时茶马活动的特点、过程及性质等几方面,剖析了茶马互市这一经济政策的实质是为巩固明政府对西部边区的统治,实现政治、经济、军事三重目的服务。丁汝俊《明代洮州卫的茶马贸易》(《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阐述了洮州卫茶马贸易的前后两个发展时期及金牌信符制度下的茶马贸易和作用。杜常顺《论明代西北地区的私茶》(《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就明代西北地区的私茶问题进行了论证。杜常顺还在《略论明代甘青少数民族的“差发马赋”问题》(《民族研究》1990年,第5期)一文中对明代甘青地区少数民族的“差发马赋”问题进行了探讨。有关论文还有谢玉杰《明王朝与西北诸番地区的茶马贸易》(《西北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和《杨一清茶马整顿案评述——明代西北茶马贸易研究之二》(《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姚继荣《明代西北诸茶马司的废置及管理》(《青海师专学报》1993年,第3期)、解秀芬等的《明清时期甘肃的茶马贸易》(《理论学习》1985年,第4期)等。

关于畜牧业的研究:吕卓民《明代西北地区的畜牧业生产》(《中国农史》1995年,第3期)对明代西北畜牧业生产的三种主要经营方式进行了分析,认为官办监苑畜牧业和军卫畜牧业先盛后衰,民间畜牧业终明一代发展情况较好。其《明代陇南地区农业经济的开发》(《西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则对明代陇南地区的农业经济开发进行了研究。马志荣《论元明清时期回族对西北农业的开发》(《兰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指出:回族在开发西北农业经济的过程中,建立了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基础,学习并推广汉族等民族先进的生产经验,使一些回族聚居区变成了西北重要的农业区,为西北农业经济发展和边疆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杜常顺《明清时期黄河上游地区的畜牧业》(《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论述了明清时期黄河上游地区的畜牧业发

展情况。唐景绅《明清时期河西垦田面积考实》(《兰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就垦田面积的逐步发展这一侧面,探讨了明清时期河西的开发状况。雍际春《简论宋代以后陇中黄土高原的农牧开发》(《甘肃理论学刊》1989年,第5期)论述了宋以后各代对陇中黄土高原地区的农牧业开发过程及其影响。此方面的研究还有马雪琴《明代西北地区农业经济开发的历史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徐象平《一部研究西北生态环境与农业发展变迁的力作——评明代西北农牧业地理》(《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年,第6期)等。

有关土地的研究:吕卓民的《明代西北地区土地垦殖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2期)阐述了明代西北地区土地垦殖情况。司俊《明代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封建土地所有制结构及基本特征述论》(《甘肃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认为该结构是以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为主体,多种封建土地所有制同时并存和发展,具有庞杂性、延续性、复合性等鲜明特征。

关于西北城市的研究:王致中《明清西北城市若干社会经济功能特征试探》(《兰州学刊》1987年,第1期)探讨了明清时期西北城市作为军需供应及仓储中心,民族市场手工业制造中心等若干社会经济功能特征,认为对其进行研究,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魏丽英《明清时期西北城市的商帮》(《兰州学刊》1987年,第2期)介绍了明清时期西北城市商帮的活动范围、结帮原因及其活动的作用。肖遥《明清西北城市手工制造丛考》(《兰州学刊》1987年,第4期)对明清西北城市的兵器制造、裁绒制作业、皮毛加工及制革业、棉纺织业、丝织业、烟茶加工业、酿酒业、玉作业、砚作业、造纸业等手工制造业进行了详细考述。岱宗《明清西北城市的市民社会经济生活》(《兰州学刊》1988年,第1期)通过描述其规模狭小的城市,商业、手工业及其他行业谋生者的状况,得出明清时期西北城市商品经济及市民社会经济生活仍处在很不发达的初级阶段。

关于粮食作物的研究:有吕卓民《明代西北地区粮食生产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3期)和《明代西北地区主要粮食作物的种植与地域分布》(《中国农史》2000年,第1期)等。

此外,梁森泰《明代九边的饷数并估银》(《中国社会经济史》1994年4月)探讨了九边粮草的单位折银数、弘治至万历前期的九边饷额并估银、九边钱数的实收入额和实在用数。在《明代九边饷中的折银与粮草市场》(《中国社会经济研究》1996年,第3期)中,他说:明代九边供饷经历了由征纳本色实物向以银折纳的变化过程。概述了九边的兵数并予以估银后,他进一步探讨了这一变化并由此论及粮草市场。田澍的《明代甘肃镇与西域朝贡贸易》(《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1期)、《明朝对河西走廊的财政政策》(《甘肃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明代河西走廊境内的西域贡使》(《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3期)三篇文章概述了明代甘肃境内的经济状况。其一探讨了西域朝贡贸易与明代国防之间的密切关系及其在明代对外关系中的重要作

用;其二系统地论述了明对河西走廊实施的中央政府直接拨款、招商备边、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的积极的和多层次的财政政策;其三则指出西域贡使为河西走廊的稳定与民族融合、贸易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高占福《明代的甘肃回族及其社会经济发展》(《甘肃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对明代甘肃回族的形成、发展、从事的农业、商业及宗教活动、语言等进行了探讨。王致中《明清时期甘肃矿业考》(《甘肃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天水市公路交通史志编写办公室编写的《元明清时期天水境内道路建设与运输》(《西北史地》1989年,第1期)、陈英和赵晓东《论明清时期甘肃的生态环境》(《甘肃林业科技》2001年,第1期)也就矿业、交通、生态等课题进行了初步研究。

三、文化

对此期文化的研究较为薄弱,特别是具有西部风情的少数民族文化。

总论:王伏平《明清文献中有关西北地区回族的记载》(《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介绍了在明清文献中记载的西北地区回族的情况。彭清深《明清时期西北实学与史地学之文化观照》(《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第3期)详细介绍了明清西北实学与史地学的定义、代表人物及著作和学术观点。

关于佛教问题:李清凌《明代西北的佛教》(《甘肃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论述了明代西北的藏传佛教、汉传佛教的发展、特点以及明政府加强对佛教管理的历史经验。先巴论述了在元、明、清三朝,甘宁青地区藏传佛教由于得到封建王朝的扶植,在藏、蒙、土、裕固等民族中不断发展,对该地区的民族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元明清时期藏传佛教在青甘宁地区的兴衰》,《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杜常顺《明清时期河湟洮岷地区家族性藏传佛教寺院》(《青海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着眼于家族性寺院在地方社会、政治、经济领域中的影响,对其兴衰浮沉作了探讨。指出:此类寺院同时发挥着神职、政治、经济功能。另还有林

健《明岷州喇嘛班丹领占象牙印考》(《文物》1997年,第2期)、公维章《元明清时期的敦煌佛教》(《敦煌学辑刊》1999年,第2期)等。

其他:张令瑾《明代庆阳府各志考述 三陇方志见知录补稿》(《图书与情报》1995年,第3期)介绍了考述、补稿原因、经过,并希望地方人士广泛搜集充实漏缺部分,订误补佚,俾成一完备史籍。刘雁翔《明代陇右学者胡缙宗生年事迹及方志著述考》(《中国地方志》1999年,第5期)对胡缙宗的生平事迹、著述、方志理论等作了考证,评价他著作宏富,是一个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创新的很有个性的方志学家。王荣华、王山林《试说明清时期在兰会馆中的神祇崇拜》(《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以许真君、关公和药王三位神祇为主,分析了外省在兰州所设会馆中的神祇崇拜现象,认为神祇崇拜对会馆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维系与保障作用。李并成《明清时期河西地区“水案”史料的梳理研究》(《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通过对河西地区“水案”史料梳理研究,得出一些启示,认为以此为鉴,对于今天西部大开发中干旱绿洲地区水土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科学管理极为有用。

四、两点感受

1. 由上文知,近25年来我国的明代甘肃研究硕果累累,大批有价值的学术论文问世,尤其表现在对经济的研究上,其次是政治,这两方面研究起步较早,研究者较多,涉及到经济、政治的方方面面。希望有更多更好该领域的研究成果问世。

2. 不足之处在于对明代甘肃文化的研究上,它起步较晚,研究成果少,相对薄弱,有些方面的研究还是空白,如明代甘肃的科举、教育、科技发展、各阶层生活习俗、娱乐等。所以,仍有待于加强对有关资料的搜集整理。

责任编辑:康亚钟;校对:三川

(上接第117页)

- ②④《答人论议院书》,《国闻报》,1898年7月14日。
②⑤《古议院考》,《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6页。
②⑥《水苍雁红馆主人来简》,《新民丛报》,1902年合订本,第24期。
②⑦《论父:立宪运动之进行》,《辛亥革命》(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4页。
②⑧《各国宪法异同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2页。
②⑨梁启超:《论立法权》,《新民丛报》,1902年合订本,第2期。
③⑩《新民说·论自由》,《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0页。
③⑪《新民说·论权利思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中华书局,

- 1989年版,第40页。
③⑫《新民说·释新民主主义》,《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页。
③⑬何干之:《中国的启蒙运动史》,生活书店,民国26年12月版,第80页。
③⑭《请归政皇上立定宪法以救危亡摺》,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③⑮《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论民主政治之本相及其价值》,《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6页。
③⑯陈仪侃:《敬告保皇会同志书》,《新中国报》,1903年12月29日。
③⑰与之:《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607~608页。

责任编辑:胡政平;校对:三川